

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通用教材

中国 现代 文学

中南五省(区)师专
《中国现代文学》
教材编写组
(下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下编)

中南五省(区)师专《中国现代文学》教材编写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3号)

永福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字数26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

ISBN7-5633-0543-2/G·476

定价: 3.20元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运动发展概况	(1)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	(1)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学的曲折发展.....	(12)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	(21)
第四节 社会主义文学的复兴.....	(28)
第二章 小说(上)	(36)
第一节 概述.....	(36)
第二节 《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	(48)
第三节 《红旗谱》、《青春之歌》和《红岩》.....	(57)
第四节 《创业史》、《三里湾》和《山乡巨变》.....	(67)
第五节 茹志鹃、峻青和王愿坚的短篇小说.....	(80)
第六节 马烽、李准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	(89)
第三章 小说(下)	(99)
第一节 刘心武、从维熙、周克芹等的“伤痕”小说	(99)
第二节 高晓声、王蒙、古华等的“反思”小说...	(107)
第三节 蒋子龙、谌容、张洁等的改革小说.....	(116)
第四节 莫应丰、徐怀中、李存葆等的军旅小说	(125)
第五节 姚雪垠、李准等的历史小说.....	(133)
第四章 诗歌	(142)

第一节	概述·····	(142)
第二节	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诗·····	(150)
第三节	艾青的诗·····	(163)
第四节	李瑛和公刘的诗·····	(172)
第五节	闻捷和李季的诗·····	(182)
第六节	《百鸟衣》《阿诗玛》等长篇叙事诗·····	(193)
第七节	舒婷、顾城、北岛的诗·····	(203)
第五章	散文 ·····	(215)
第一节	概述·····	(215)
第二节	魏巍和刘白羽的散文·····	(225)
第三节	杨朔和秦牧的散文·····	(234)
第四节	巴金和吴伯箫的散文·····	(243)
第五节	徐迟的报告文学·····	(251)
第六章	戏剧 ·····	(257)
第一节	概述·····	(257)
第二节	老舍和田汉的戏剧·····	(267)
第三节	《万水千山》和《霓虹灯下的哨兵》·····	(277)
第四节	《陈毅出山》和《报春花》·····	(285)
第五节	《陈毅市长》和《绝对信号》·····	(292)
第六节	《洪湖赤卫队》和《刘三姐》·····	(299)
第七节	《十五贯》和《潘金莲》·····	(306)
第七章	影视文学 ·····	(314)
第一节	概述·····	(314)
第二节	电影文学剧本《董存瑞》、《李双双》、 《巴山夜雨》和《孙中山》·····	(326)
第三节	电视文学剧本《凡人小事》、《走向远方》和	

《寻找回来的世界》	(337)
第八章 台港文学	(346)
第一节 台港文学概述	(346)
第二节 纪弦、余光中、吴晟、蒋勋的诗歌	(357)
第三节 钟肇政、白先勇、黄春明、杨青矗的小说	(367)

第一章 文学运动发展概况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

一 新的社会与新的文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座历史界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座历史界碑。一般地说，人们把这座界碑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当然，一个文学时代的出现或终结不一定都与某一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相伴随。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也是给世界历史进程以强烈震撼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由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①的自豪感，洋溢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胸中。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是遥远的憧憬，而是亿万人民群众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化。以反映社会现象、社会意识为职志的文学，不能不受到这一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及其所开创的新的社会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

^①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页。

代。

这个文学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文学与社会几乎同步发展。人民政府在广大的城乡建立起来，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顺利完成，战争的创伤迅速得到治愈，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第一部人民宪法的颁布，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宣告实现，等等。这些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带给人民的是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是胜利的欢欣，是对于生活必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的确信。这种明朗、热烈而又充满信任感和幸福感的社会情绪，感染和激励着愿意投身到人民生活中去的作家。于是，真诚地讴歌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和新的社会，就很自然地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琴弦上奏出的主旋律。何其芳的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胡风的多乐章长诗《时间开始了》、老舍的话剧《龙须沟》、曹禺的话剧《明朗的天》、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谷峪的短篇小说《新事新办》、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等等，无疑都留下了社会生活前进的足迹，澎湃着社会情绪的涛声。

二 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文代会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一直把文学艺术事业看成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取得执政党的地位以后，它就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领导职能，通过一些意义重大的组织活动，把文学艺术事业完全纳入实现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第805页。

社会主义目标的轨道。

(一)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这次大会,是1949年7月2日至7月19日在即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当时仍称“北平”)举行的。来自解放区和来自原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代表824人,参加这次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盛会。大会听取了周恩来作的《政治报告》、郭沫若作的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作的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和周扬作的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这些报告,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特别是解放区人民文艺运动的经验,明确宣告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是新中国文艺的根本方向。为了团结全国文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艺传统,实践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创造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崭新的文学艺术,大会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以及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等下属机构。这次文代会,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组织上看,都不愧为当代文学运动亦即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伟大开端。由此形成的真实反映社会主义实践并给予从事这一实践的人民群众以强大精神力量的文学潮流,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当然,这次大会也有它的历史局限,其主要表现是:在重视和推广解放区文艺运动经验的同时,相对地忽视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强调深入工农兵,表现工农兵的同时,相对地忽视了文学主题、题材和

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要求；在大力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同时，相对地忽视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的形势下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些局限性，与后来渐次发展的文学上的左倾教条主义，不能说没有一定关联。

（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四年，即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经验教训，号召作家、艺术家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需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与第一次文代会相比较，这次大会至少在如下两个问题上有明显的发展：一是根据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严肃地提出了克服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要求；二是从创作方法上提出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歌颂新生活的热情与他们对新生活的熟悉程度、认识深度有较大距离，因而写不出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和文艺批评，存在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条化的理解，即往往只从政治倾向性的单一角度，要求作家这样写，不要那样写，并且对一些真实性比较强、艺术上有所创新的作品，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如1951年对肖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的批判等。创作与批评上的这些缺点，表现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初创时期的“现实主义薄弱”^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这种“现实主

^①周扬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

义薄弱”的弊病，大会接受了苏联文艺界30年代就提出的口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比较流行的解释是：“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①这个口号及其一般解释，至今还有争议。但是，应该承认，它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是起过积极的指导作用的。

此外，1956年3月15日至30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青年文学工作者会议。这样的会议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首创的。它表明党和新中国的文艺界，十分重视文学新人的培养。实践证明，与新中国一道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虽然在崭露头角不久就不同程度地受到压抑，但是他们毕竟成为当代文学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

三 几次重大文艺思想斗争述略

建国初期的文艺思想斗争是很频繁的，而且往往采取行政干预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这与当时的重视阶级斗争，不断地进行政治运动不无关系。由于常常把文艺思想问题与政治立场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时期的几次重大文艺思想斗争，实际上都缺乏自由争论的空气，而带有浓厚的政治批判或哲学批判的色彩。

（一）关于《武训传》的讨论

《武训传》是1950年底上映的一部历史人物传记影片。

^①《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转引自蔡仪《文学概论》第256页。

编者**孙瑜**（1900年——），四川重庆人，是30年代以编导进步影片《大路》而成名的电影艺术家。《武训传》文学剧本是抗战后期在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启发和鼓励下编写成的。影片的拍摄早在解放前夕就开始了，后因上海战事而中断；解放后重新摄制完成，并迅速在全国上映。上映之后，文艺界、教育界许多知名人士都纷纷发表文章，给该片以肯定的评价。其间，也有少数评论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该片赞扬的“武训精神”实在“不足为训”^①。

195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日，该报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于是，关于一部影片的得失的讨论，很快就成为一场波及全国的“一边倒”式的政治批判运动。社论指出《武训传》的主要问题是：（1）影片歌颂“行乞兴学”的武训，是完全歌颂错了。因为“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影片歌颂武训的“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实际上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2）许多人歌颂武训或歌颂电影《武训传》，也是歌颂错了。因为这些人不去研究中国一百多年来

^①贾雯：《不足为训的武训》，《文艺报》第4卷第1期（1951年4月25日出版）。

的历史变迁，没有能够正确地“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这种错误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中，编者孙瑜作了公开的自我检讨，郭沫若、陈荒煤、夏衍、钱俊瑞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也都发表文章，或作自我检查，或说明自己在这运动中吸取了哪些教训。至同年8月，这场历时了个多月的批判运动，才告结束。

本来，武训（1838——1896）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行乞兴学”的一生事业，是完全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考察、分析和批判的。《武训传》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人物传记影片，它在思想上艺术上的得失，也是完全应该进行具体的与人为善的讨论的。但是，由于当时采用了行政干预的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使讨论变成了异口同声的“声讨”，使不同的意见未能通过充分讨论求得大抵的一致。这就为此后的文艺思想斗争开了一个不良的先例。

（二）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9月，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论文，批判《红楼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俞平伯的观点。同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这两位作者的另一篇论文：《评〈红楼梦研究〉》。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对李、蓝的文章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对《文艺报》、《人民日报》曾经拒绝刊载李、蓝的上述文章一事，提出尖锐的

批评：“《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挡‘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青年人向久负盛名的权威挑战，一般说来，是应该鼓励的。向来很关心文艺事业的毛泽东也许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亲自发动了这场《红楼梦》研究领域的思想批判运动，並有意识地把运动引导到在整个文化学术领域里清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轨道上。

俞平伯（1900年——），浙江德清县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诗人和散文作家。20年代初，他受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等著作的启发，开始潜心研究《红楼梦》，并于1923年出版了《红楼梦辨》一书，因此而与胡适一起成为“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1952年，他把经过改订的《红楼梦辨》更名为《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年3月，他又在《新建设》学术月刊上发表了长篇论文《红楼梦简论》（后成书印行），对他几十年的研究过程和成果，作了扼要的总结。俞平伯和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胡适的研究工作，在“红学”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他们突破了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旧红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在《红楼梦》的著者生平，版本真伪等方面作了认真的考证，而且揭示了《红楼梦》的创作与前代文学名著《西厢记》、《金瓶梅》的继承关系。他们的学术成就，无疑是“红学”的宝贵财富。至于当时批判俞平伯的一些主要观点和方法，如“自叙传”说，“钗黛合一”说、“色空”说以及考证方法的繁琐等，都是学术研究范围内应该深入讨论的问题，是不能也不必在一次批判运动中做出裁决的。而且把

俞平伯与胡适处处拉在一起，也不够公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受过胡适的影响是事实，但俞平伯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并非亦步亦趋地跟在胡适之后。例如，对于胡适首先提出的《红楼梦》是著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这个观点，俞平伯就没有轻易苟同，他在1925年发表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说《红楼梦》取材于曹家“可以讲得通”，若说贾宝玉即曹雪芹，“便说不通”。1952年，他在《红楼梦著作年代》一文中又说：“书中贾家的事虽偶有些跟曹家相合或相关，却决不能处处比附。”象这样一些与胡适不同的观点，在批判中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从1954年9月到次年1月告一段落。它的积极意义是推动了“红学”的发展，使这门学问进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时代，亦即充分肯定《红楼梦》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时代。它的消极意义也与《武训传》的讨论一样，即采用行政干预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对“红学”中的一派观点采取不容争辩的“政治围攻”办法，使本来应该深入探讨的古典文学名著的现实主义成就问题，得不到充分展开。而且，因《红楼梦研究》的问题，而改组了《文艺报》编委会，撤销了冯雪峰的主编职务，这又比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发展”了一步，即开了以组织处理来解决文艺思想问题的不良先例。

（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持续最久的一场文艺思想论争。**胡风**（1902——1985）湖北蕲春县人，原名张光人，30年代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

口号的论争中，他成为“国防文学”论者的众矢之的。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创办《七月》和《希望》杂志，形成了一个以他为精神领袖的文学流派——“七月派”。40年代中期，重庆、香港的进步文艺界，曾公开讨论和批评过他的文艺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从香港回到大陆，投身建国初期的文学运动，先后担任过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杂志编委。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报告》的第一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二人于1953年对他的文艺思想的公开批评^①；《报告》的第二部分《作为参考的建议》，提出了他改进文艺工作的一些具体意见。1955年1月，《文艺报》把胡风的《报告》的主要部分摘出冠以《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名印出，作为刊物的“附册”内部发行，“供批判用”。

2月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至5、6月间，《人民日报》先后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大多是私人来往信件摘抄），毛泽东亲自为这些材料的公布写了“序言”和“编者按”。于是胡风成为“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依法严惩”，身陷囹圄。案件牵连了数千人。胡风本人直到1979年才获释，“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建国初期文学运动中“左”倾教条主义发展的一个高峰；所谓“胡

^①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见《文艺报》1953年第2期；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见《文艺报》1953年第3期。

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后来“文革”中众多冤案以外的极其惨烈的一桩冤案。

作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文艺批评家，胡风的文艺思想自然是很值得认真讨论的题目。他的“写真实”和“主观战斗精神”的文学主张，是他忠于生活、忠于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民文学运动当中，他的劳绩与功绩，不应受到抹杀。至于他在理论上、情绪上的某些偏颇，应该通过深入的研究、平等的讨论来作具体分析和纠正。

综合建国初期的文艺思想斗争，人们无法否认这样的基本事实：每一次都以“左”倾教条主义文艺思想的取胜而告终。这个事实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自然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首先要克服“左”倾思想的干扰。这是从历史教训中引出的结论。

四 “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

1956年，中国的文艺界出现了一股积极“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这股思潮的基本特征是：正视现实，勇于探索，以积极的态度与生活中的消极因素作斗争，推动生活的健康发展。

“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的出现，是社会发展与文学进步的必然产物。新中国成立好几年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种新鲜感慢慢消失，胜利的欢欣也渐趋平静；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逐渐暴露出社会结构、社会意识中与新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东西，特别是党和政府中的一些干部，或安于现状，不图进取或居功自傲，脱离群众，不能

高效率地解决建设中的问题。生活中的这样一些消极现象，越来越清晰地被人们感觉到。一些责任感较强和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首先把目光投注到阻碍生活健康发展的“阴暗面”上，于是产生了一种“忧虑”意识和“干预”激情，写出了一批以批评性为主要特色的文学作品，如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的中篇小说《田野落霞》，邓友梅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等等。这些作品，不仅以其灼热的批评锋芒，引人瞩目，而且以其对人的生活、人的心灵的关注，预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丰富和广阔的前景。这股生机勃勃的文学思潮，还得到了苏联当代文学的启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的鼓励。苏联报告文学作家奥维奇金的《奥维奇金特写集》，小说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作品，先后在这个时期被介绍和推荐给中国的青年读者，并且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56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文学思想的解放，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学向艺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是这一进军的先锋。可惜时隔不久，先锋受挫，一股刚刚兴起的紧贴现实，正视矛盾的文学思潮，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成了忘不掉而又说不得的文学潜流。这是社会主义文学开拓受阻的一个生动事例。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学的曲折发展

一 文艺界的“反右斗争”